

鲁迅中期思想研究

徐麟 著



鲁迅中期思想研究

徐 麟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鲁迅中期思想研究

徐 麟 著

责任编辑：何海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望城县湘江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开 11印张 276千字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册

ISBN7—81031—555—2/I·041

定价：16.00元

序

本书的标题是“鲁迅中期思想研究”，但实际上我希望的，是为鲁迅中期的整个精神状态——思想和心态——描绘出一个基本轮廓，并试图从中把握到某种意向性的东西。

在这里，我设定了一个鲁迅“中期”的概念，以特指他文学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即《呐喊》、《彷徨》和《野草》的创作期。它始于《呐喊》首篇《狂人日记》的写作（1918年），终于《野草》末篇《题辞》的完成（1927年）。我所以要把它作为鲁迅生命中的一个阶段，并作为专门对象来研究，不仅因为这一时期的鲁迅创作，确实首尾呼应，自成一体，具有相对独立的完整性，而且因为这是鲁迅一生中精神最痛苦、思想最复杂的时期。他的该期创作，不仅在形式——小说和散文诗——上，为他该期所特有，而且其内容深含了一种极其独特的文化和哲学意蕴，大部分读者都会被那种为痛苦所层层包裹着的、诗意的心灵深度和人格力量所吸引和震慑，并以此作为他们了解鲁迅的动力和起点。所以在我看来，了解鲁迅的中期的思想和心态，不仅是理解他的该期作品，而且是把握他思想发展，乃至整个人格的关键所在。

在鲁迅研究中，以往国内学界对于鲁迅思想发展历

程的分期，多着眼于他何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以此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后期是马克思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前期则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这种分期法所依据的价值尺度，严格地说，不是思想，而是政治。政治当然也有其思想表现，但如果“思想”的含义，是指人们对于整个世界和自身存在的理解思索和理性表述，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它应该包括政治的见解、观点和倾向等，却不能仅仅归结于它们。现有分期法对于鲁迅来说，可能产生的错位就在于，鲁迅不是一位政治家，他毕生思想的丰富和深刻之处，几乎都表现在非政治范畴的文学、文化、哲学以及生存态度方面。而且，它们实际并没有随着政治观点的变化，而必然地相应变化，相反，倒常常呈现出一种超越政治的稳定性。当然，从时间上说，1927年在鲁迅的生命中，确实具有某种分界线的意义，但这个意义实际维系于他整个生存方式及其态度的变化，而政治只是这个变化中，一个较为外在的诱发因素。至于导致这一变化的真正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则完全来自于他中期的另一种体验。

1925年，鲁迅在一封信里剖白自己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①。我以为，这不仅是鲁迅自己对他的该期思想和生存状态所作的最简明、最准确的概括，而且他从这里提出了一个在他毕生思想中，最具心灵深度的哲学命题——绝望的抗战。

^① 《两地书·四》。凡本书所引用的鲁迅作品，均出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十六卷本）。

正是它，把鲁迅的中期生命态与他的前、后期，作了判然区分。

这个问题，对于鲁迅现实生存来说的重要之处，固然在于他为什么绝望和如何绝望，但更在于他是如何从“绝望”之中，推出“抗战”这一行动结论的。绝望就是无希望，无论在生存状态还是心理状态中，这都是一种危险的边缘境遇。由于它不能为行动的选择提供意义的指向——希望，所以它就无法指向任何积极行动，因而与“抗战”的行动并没有必然性的关联。况且，众所周知，中国历来不乏麻木的顺民、冷漠的看客和闲适的隐士，他们从来都是在绝望或无所谓希望之中，沉沦，逍遥，而不抗争。但在鲁迅，“抗战”却成了他的终生使命和命运，而这，才使鲁迅成其为鲁迅。反抗并不难，但难于“绝望的抗战”，因为每个人都必然和必须为自己的生存和行动，找到价值依据。即便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也绝不会坚持不懈地干一件他认为毫无意义的事。那么，鲁迅是根据什么，来选择“绝望的抗战”的呢？

如果按瞿秋白的、并且也为多数鲁迅研究者所接受的说法，鲁迅的思想发展，是一个“从进化论到阶级论”^①的过程，那么“绝望的抗战”就成为该过程中，一个不可解释的现象。如果说，绝望与进化论的乐观主义不能相容，还可以解释为鲁迅对于进化论的绝望，或进化论的破灭的话，那么“抗战”的行动依据就成为问题。从《野草》后半部的作品，尤其是作于1927年的《题辞》来看，

① 何凝（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青光书局，1933年。

充溢于中的乐观精神，显然根于某种生存意识，而不是阶级论的产物，但又显然那时鲁迅已经走出了绝望的峡谷。这就是说，“绝望的抗战”，既不是进化论所能描述，也不是阶级论所能解释，那么鲁迅的这个“抗战”又何以成为可能呢？而且，如果他不能走出中期的绝望心境，就不可能有后期的思想发展，自然更谈不上“阶级论”了。所以，鲁迅从中期走向后期发展的内在能源和价值指向，实际还必须到“绝望的抗战”本身中去寻找。

近年来，国内外有些研究者开始把眼光投射到鲁迅的心理深处，试图通过心理分析来描述鲁迅的个性、气质、欲望和内心冲突，等等。这对于鲁迅研究来说，确实不失为一种较新的视角，它为读者理解鲁迅其人，提供了不少启示。但是，心理分析方法本身存在着的致命弱点，限制了它的意义，并使它在西方一直受着猛烈的批评。^①它的根本问题在于，它所使用的都是涵盖面极大的诸如无意识和“类”意识范畴，因而它所揭示的人物心理状态及其矛盾冲突，也只属于“类”而并不具备充分的个人特征。更重要的是，心理分析法在哲学上，把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动机，完全建筑在无意识的基础上，这不仅因取消了人格及其价值意向，而使个人动机成为一个低级的“类”的抽象物，也使不断展开着的个体人格及其历史，也

^① 参见〔美〕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其心理史学的破产》，冯钢、关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

成为同样的抽象物^①。因此，单纯的心理分析实际上并不能描述出一个人的行为系统的完整轮廓，因为这里涉及到整个行为系统的动机准则问题。这是一个价值观念问题，说到底，就是信仰问题。信仰当然也有其心理基础，但它却并不等于无意识、气质或心态等等心理基础本身，因为信仰的意向性并不指向心理内部，而是指向价值世界，一个形而上的超验世界。人只有在它所给定的终极价值的依据下，才能赋予并且把握住自己的生命意义，才能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并由此获得整体性的自觉行动能力。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所谓人格整合才是可能的，人的行为动机及其某些心理特质，才能真正成为可理解的东西。但是，这已经走出了心理学的范围，而成为一个哲学问题了。虽然它并不拒绝来自于心理学方面的各种支持，但心理学并不比其他自然科学更接近哲学^②，自然更不能取代哲学。

显然，“哲学”的含义在这里，已像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那样，不是理论，而是活动，^③ 是一个人对于自身存在的选择、创造、体验和言说。对于鲁迅，人们尽可以根据他所从事的现实活动，来指称他的身份，如“文学家”、“思想家”等等。但每一个真正了解鲁迅的人都会有一种

① 在揭示人类生活的无意识基础方面，精神分析理论无疑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具有重大意义，但它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并不同样成功，因为它几乎无一例外地仅通过几个诸如“利比多”、“压抑”、“升华”等无意识范畴，来揭示个体心理矛盾，而完全忽略了价值观念、信仰和人格的整体意义。

②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4页。

③ 〔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郭英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49页。

直觉，那就是鲁迅所从事的各种活动，实际上都围绕着一个价值核心，即对于生命存在及其意义的探索和思考，这就是他的哲学活动。所以，鲁迅从“绝望”之中义无反顾地走向“抗战”，固然有许多心理原因，但在根本上，这是一种哲学选择——信仰和人格的选择，否则，历史上就不会有鲁迅“这一个”的存在。当然，鲁迅没有哲学专著。因此谁都不会认为他是哲学家，甚至怀疑他到底有没有哲学。但如果我们把哲学理解为一种存在性活动的话，那么可以说，中期的鲁迅正是一位哲学家的鲁迅，并且可以无愧地被誉为中国现代史上一位最优秀的哲学家。不仅因为他所关注、思考，并用整个生命去探索和论证的，是一个几乎被全民族遗忘的而又极其严峻的个体人格的生存问题——这正是整个现代中国人文精神建构的核心问题——而且，他在《野草》中所达到的哲学境界之深邃，堪与任何一位西方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相媲美，而区别仅在于，鲁迅的哲学语言是诗，而不是理论。

一旦人格生存被作为自觉的生命形式，作为一种哲学活动来理解和描述，那么“思想”概念马上就暴露了它的狭隘性，而变得苍白无力。因为思想作为一种理性的活动，可以诉诸语言，被说出来，成为被研究者自己公布的材料。而作为生命形式的人格、状态，及其很多被称为“存在性体验”的东西，却因跨入了意志和“意义”的世界，而变得不可说。它可以被“可说的”语言意指出来，但同时又可能被它们所遮蔽而变得晦暗不明。这样，研究对象的出“格”，也就把研究者及其研究本身卷入了一场

语言冒险之中，不仅因为它呼唤着一种更为深沉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感，以关注、审视，并重新体悟生命的存在、意义，以及文化历史氛围的被给定性，从而必须去说许多不可说的东西，而且这意味着，对象不再是纯粹的外在客体，它同时要求研究者真诚地面对自己，面对生命和存在，并为此投入全部的生命激情，击碎那些使我们一直陶醉至今的虚假的自我牺牲精神，及其所有副感觉——崇高感、自豪感和悲壮感，而与研究者——鲁迅——一起，去面对、体验和承担起这份文化和历史的赠与——沉重与痛苦。

也许这根本不是一种学术态度。据说，学术所要求的，只是纯净的理智，而必须杜绝可能导致学术偏斜的情感、意志和一切非理性因素的投入。这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在我看来，学术就是学者把自己投入存在的途径和方式。只要他是真正直面生命和存在的，那么，“学术”本身也必将随着“思想”的狭隘性的被突破而被突破。因为对于研究者来说，这本身就是一种生存方式或生存态度，也就是一种人格宣言。并且，在某种文化和历史的潮流中，它将显现为一种命运，而与研究者终生相随。

因此，如果说本书的研究目的，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无非是通过对鲁迅的理解，来了解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可能的将来。但问题是，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这个了解本身就意味着一种选择——人格和生存态度的选择，意味着对于自身命运的理解与承担。这个命运，正是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历史给我们这个时代的赠予，而

鲁迅是它的第一个自觉承担者。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为描述人类历史而创造了一个名词“轴心时代”。^①它指的是约公元前8至2世纪，人类在精神上的一个大突破的时代。那是一个价值创造的时代，东西方的圣哲们，都不约而同地从人类童蒙中苏醒过来，第一次把他们博大的胸怀，深切的关注，投向了人类生存的基本问题，并以活生生的哲学，为两千多年来的人类生存，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依据，使人们能在现实的苦难与困惑之中，找到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勇气，从而成为两千多年来，人类历史绕之旋转的价值“轴心”。

但本书却在另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我们现在虽然还是生活在轴心时代的价值投影下，但历史已经步履蹒跚地来到了它昏暗的最后边缘。大气污染，资源枯竭，人口爆炸，生态失衡，正在把人类推向空前的生存危机之中。同时，人类在精神上，也正经历着一场价值崩溃的历史性劫难。1918年7月，一本题为《西方的没落》^②的书在维也纳出版，轰动了整个欧洲，我们从书名上就能猜得出它引起轰动的原因。在此之前两个月，一篇题名为《狂人日记》的短篇小说，在人类文化的另一极北京问世。说它给整个中国历史带来了颤栗，是绝不过分的，因为它展示了鲜血淋漓的东方的沉沦。它们的两位作者——斯宾格勒和鲁迅，在物理时空中毫无联系，但在人类文化的

①〔德〕卡尔·雅斯贝尔斯：《智慧之路》第9章《人的历史》，柯锦华、范进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第69页。

②〔德〕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陈晓林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

价值时空中，他们都同时感觉到，并且预言了一个人类性的文化时代的殒落。

也许，每一种文化最后能向它自身提供的东西，就只有绝望，尤其是在这个价值崩溃的时代里。而鲁迅，东方文化的一位最痛苦的现代先知，不仅用他的全部生命激情，时时感受着这一点，而且他背负起了一个古老文明的垂暮与荒凉，承担起了一个现代灵魂的孤独与绝望，沉重地起步，艰难地探索。他用自己的血肉，燃起文学的灯火，把中华民族自我认识的日程大大推前，并开掘了一个至今仍为我们所难以窥测的深度。他的探索，不只是一种思想和艺术的表达过程，而且是一个生命和人格的展现过程，这就是他的命运，正是在他的全部痛苦中，渗漉出了一个古老民族最强烈的生命渴求——走出轴心时代！

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龙，
一条具有哥德尔精神的龙，
一条拼命想从二维平面挣扎出来的龙。^①

① M·C·埃舍尔木雕“龙”，见《GEB——一条永恒的金带》，乐秀成编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立意在反抗	(1)
一 启蒙者之路	(1)
二 命运与意志	(6)
三 呼唤摩罗	(11)
四 黄昏的猫头鹰	(19)
第二章 绝望的抗战	(23)
一 危机与荒谬	(23)
二 被误读的历史	(30)
三 “铁屋子”	(43)
第三章 救救孩子	(55)
一 “中国的尼采”	(55)
二 最清醒的疯狂	(65)
三 语言与历史的对抗	(74)
第四章 沉默的国民的魂灵	(80)
一 新的焦虑	(80)
二 寓言与示范	(84)
三 中国的最适者	(88)
四 礼·治·道	(93)
五 混沌的漩涡	(99)
第五章 沉沦与疗救	(103)

一	生存的匮乏·····	(103)
二	意志的丧失·····	(107)
三	人道的真空·····	(119)
四	心理的窒息·····	(126)
五	生命的萎缩·····	(134)
第六章	沙漠游勇·····	(151)
一	文化悖论·····	(151)
二	超负荷运行·····	(160)
三	从呐喊到彷徨·····	(166)
四	启蒙主义的覆没·····	(174)
五	无话可说的话·····	(182)
第七章	希望·绝望·虚妄·····	(191)
一	言说的空虚·····	(191)
二	存在与虚无·····	(197)
三	拥抱死亡·····	(202)
四	生命的追问·····	(209)
五	虚妄主义·····	(218)
六	无可为之为·····	(226)
第八章	新的生路·····	(241)
一	自我的两极·····	(241)
二	汉姆雷特之谷·····	(252)
三	无治主义·····	(262)
四	生者与死者·····	(270)
五	逃亡与求索·····	(277)
第九章	结语：走出轴心时代·····	(281)
一	拯救与话语·····	(281)
二	上帝的荒谬·····	(283)
三	耶稣主义·····	(290)

四	存在的勇气·····	(293)
五	信仰与选择·····	(297)
六	以恶抗恶·····	(304)
七	良知与道德·····	(311)
八	殉难与复活·····	(316)
九	文化的悲怆·····	(320)
十	走出轴心时代·····	(328)
后 记	·····	(335)

第一章 立意在反抗

一 启蒙者之路

说到鲁迅中期的绝望，人们自然会问，鲁迅为什么会绝望？实际上，那危机的种子，在他的早期就已经深深植下了。虽然仅就走上启蒙主义道路这一点来说，也许他与同时代的其他爱国志士们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但是，鲁迅的启蒙主义，一开始就显露了独异的深度。这不只是一种思想风格，根本上就是一种人格深度的表现。正是这种人格深度，预示了他必然会走上一条与众不同的精神道路，而绝望，不过是早就在这条路上等着他的“死亡峡谷”而已。因此，在谈及鲁迅的中期思想之前，必须先追溯到他的早期启蒙主义思想。

在这里，一般地描述一下启蒙主义的基本特征，无疑是必要的。尽管东、西方的启蒙主义，都不是统一的思想，并且作为不同的文化产物，形态上也相去甚远。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们作为一种基本目标一致的社会文化思潮相比较，从而找到一些形式上的类同点。

首先，作为启蒙运动产生的社会前提，必然是极少数的社会或民族优秀分子，感受到了社会现实生存状态与理想状态的巨大差距，而被激发出强烈的不满情绪和改革要求。其次，在这些优秀分子看来，这种不合理的生存状态的形成与改革，最终都取决

于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思想觉悟水平，因而他们把改革的要求，具体化为以理性批判和启蒙教育为中心的社会行动。其三，这种行动的内在构成，在启蒙者那里，要对自身的觉悟水平和行动能力充满自信，否则，就谈不上启蒙行动。但这种自信实际上又已经是一种对象性的价值态度，因为它与另一种外向的确信互为前提，那就是启蒙者对于启蒙教育的客观有效性，亦即启蒙对象的可改变性，持确信态度。而这同时又涉及到了希望、行动的意义和价值指向等问题。所以，仅仅感受到社会的不合理性，还不足以构成启蒙行动，因而其四，启蒙者还必须依据于某种预设的观念，赋予自己以历史的使命感或责任感；以及其五，他们还要对人生、社会，乃至于历史的可改变性，持乐观态度。因此，启蒙主义是一个社会性的系统工程，无论缺少上述条件中的哪一项，都无法导致启蒙运动的出现。

如这么看，那么作为启蒙主义者的鲁迅，他最大的幸运也许就在于，他生逢我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最富有文化创造气氛的时代。它似乎一开始就为塑造他而准备好了所有条件，外在的和内在的。当然，幸运同时就是不幸，因为那是一个痛苦的时代，每一个投身于它的人，都必须准备承受它的痛苦，并必须通过这痛苦，去体验和把握历史、社会、人生和生命内在最深沉细微的东西。

在鲁迅踏上启蒙者之路以前，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屈辱的民族近代史，已经暴露了整个旧中国的内囊，志士仁人们终于透过文化“乐感”下的历史错觉，开始真实地看到贫穷落后、被动挨打的民族生存现状。这一点，构成了中国近代以来一切改革的起点和动因，并且作为逻辑前提，它一开始就已经预设了中国改革的受动性和切近的民族主义功利主义倾向。在鲁迅之前，中国的志士已经在救国之道上走过了两大步。第一步是洋务运动。虽然这只是一个由官方发起的，以枪炮制造技术的引进为中心的次经济